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三九期 ——
(二〇〇八年四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4b)

【本刊专稿】	罗瑞卿遭整肃的几个关键因素	欧阳龙门·司马清扬
【研究动态】	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刘国新
【回首文革】	父亲刘仁静在“文革”中	刘文澜
【年终盘点】	2007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樵余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本刊专稿】

罗瑞卿遭整肃的几个关键因素

• 欧阳龙门·司马清扬 •

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同一天，杨尚昆被免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一个月后，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的罗瑞卿遭到整肃。此后，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

对于罗瑞卿遭整肃一案，中共官方目前的说法是：林彪指使别人写了诬陷罗瑞卿的材料，让叶群去向毛泽东诬告罗，而“这一诬告使毛泽东相信了，并加以支持和批准”（1）。于是造成了冤案。

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则有更进一步的说法：“毛泽东虽然在后来说过，他整爸爸是因为他对林彪‘偏听则暗’，但此时如果不是另有原因，他才不会被林彪更不会被叶群的意见所左右。事实是，在林彪要毛泽东帮助他搬掉爸爸这块绊脚石的时候，毛泽东的心里正在涌动着更大的革命波澜。为了掀起这个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波澜，为了除掉睡在他身边的赫鲁晓夫们，它需要林彪作为盟友。所以，罗瑞卿成了革命棋盘上一个需要牺牲的棋子，成了毛泽东这位平衡大师的一个砝码”（2）。

本文要指出的是：

（1）“毛泽东因为要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与林彪结盟，所以要整倒罗瑞卿”，事实上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事情的另一方面是：罗瑞卿并不仅仅是象罗点点所说那样是林彪的“绊脚石”，而且是已经直接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不整倒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将无法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展开。这才是罗瑞卿遭整肃的第一关键的因素。

具体的证据就是：江青作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代理人，曾要求罗瑞卿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被罗瑞卿拒绝。

本文认为：这件事成为毛决定整罗的触发因素，即所谓“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

（2）“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因此诬陷罗瑞卿，而毛泽东相信了林彪”，事实上这只是造成罗瑞卿被整肃的诸多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因素。其他一些人，诸如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聂荣臻等也与罗有很深的矛盾，这些人也同样向毛泽东、林彪告罗的状，这些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只是因为这些人属于“老一辈革命家”，所以他们在罗瑞卿冤案中应该承担的份额被中共官方大大地减低，以致抹去了。而林彪应该承担的份额则被不成比例地加以夸大。

本文认为：林彪以及其他一些人，诸如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聂荣臻等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都应该客观地加以描述。

一、整肃罗瑞卿的决定性因素和触发因素

首先，整肃罗瑞卿的决定性因素是毛泽东而不是林彪。不论是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谗言，还是毛泽东要与林彪结盟开展文化大革命而牺牲罗瑞卿，仅仅靠林彪是无法整肃罗瑞卿的，必须要毛泽东的明确同意。关于这一点，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都不否认。

但是，整肃罗瑞卿的触发因素却为各方所忽略，那就是罗瑞卿本人在当时已经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如果不整倒罗瑞卿，文化大革命将无法按照毛泽东的预期展开。

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极为重要的一步棋。两个月后，中共中央为此发出题为《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文件。这份纪要提出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为文化大革命的展开提供了理论依据；这份纪要表明了毛泽东利用军队的力量来冲击文化领域的决心；更重要的是这份纪要为毛泽东的文革代理人江青介入文化大革命、介入军队，提供了机会，让江青在中国的政坛上以引人注目的身份亮相。这也是毛泽东将林彪拉上文革的战车、给世人造成林彪、江青结盟的一个印象：即使林彪并不十分情愿，但是林彪还是接受了江青介入文化大革命、介入军队的事实，并且为其张目。为江青以后成为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顾问打下了基础。江青要请解放军、请林彪这座“尊神”的目的是达到了（3）。

对于这么重要的一个会议，毛泽东最初是通过江青找到罗瑞卿，要求召开。由于罗瑞卿置之不理，未能如愿。直到罗瑞卿倒台以后，这个会议召开才得以实现。

对此事实，很早就有人提到。1978年，罗瑞卿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写道：“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江青多次给罗瑞卿同志打电话，纠缠不休，说她要召集一个文艺座谈会，请罗瑞卿同志

参加。罗瑞卿同志十分反感，置之不理，使江青的阴谋未能得逞。当时，江青还要求给她发军装，罗瑞卿同志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一套，她没有军籍，领章帽徽不给她发”（4）。

后来参加过部队文艺座谈会的刘志坚也提到：“江青先找罗瑞卿，要到部队开文艺座谈会，被拒绝了。在林彪捏造罪名打倒罗瑞卿之后，江青就转而去林彪”（5）。

《罗瑞卿传》的作者黄瑶在1991年写道：“江青曾找罗瑞卿，借口贯彻毛泽东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要求在部队召开座谈会，以发动整文艺界。罗婉言拒绝。江青怀恨在心。翌年4月，她终于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了部队文艺座谈会，炮制了整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6）。（但是不知为何，在1996年出版的《罗瑞卿传》（7），此事却被作者略去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证据证明：到底是罗瑞卿不明白江青是代表毛泽东提出这个要求的呢，还是罗瑞卿明知道是毛泽东的意思，仍然要加以抵制。但是，在毛泽东和江青看来，罗瑞卿这样做不是偶然的。因为在此之前，毛泽东对曾多次文艺界表示过不满，而罗瑞卿却针对毛的这些不满提出不同的意见来辩解。

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8）。

1963年12月12日，毛泽东又在一个批示中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9）

罗瑞卿不可能听不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不可能看不到毛泽东的批示，但是他却在1963年12月21日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讲：“这些年，我们文化艺术工作的方向更加正确了”（10）。

接着，罗瑞卿又在1964年1月4日和7日两次在驻京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为一些遭到错误批判的文艺作品辩护”（11）。

1964年5月12日，罗瑞卿又在在全军三届文艺会演大会上讲：“军队文艺工作的方向，总的说来是对的，实践也是对的，或基本对的。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出艺术”（12）。

当时，毛泽东和江青高度重视文艺界的动向，正在寻找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罗的这些言论都是公开讲话，尤其是在毛泽东有言在先的情况下，不可能不引起毛泽东和江青的注视。

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又写了语言更为尖锐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3）。

而罗瑞卿的基本看法却是：“部队文艺界还是好的，政治方向已经解决了，现在的重点主要是提高艺术性，在部队内没有必要整文艺界”（14）。“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15）。

文艺界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自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出对文艺界的责难，但是在毛泽东看来，收效甚微。对比毛泽东和罗瑞卿有关文艺界的言论，不能不认为两者有明显的对立。有关言论以后成为中共中央文件指控罗瑞卿“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的证据（16）。

自1962年以后，毛泽东不断强调“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强调“突出政治”，相对于林彪积极配合的态度，罗瑞卿的态度是消极的，是“折衷主义”的。李志绥在一九六四年六月“便感到罗的政治地位堪虑”，“毛有次对我批评罗说：‘罗瑞卿那么大的个子，白浪费衣服料子’”（17）。

罗瑞卿的种种言论、加上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的看法、再加上罗瑞卿对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的抵制，不能不让毛泽东认为罗瑞卿就是“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的人，罗瑞卿已经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

从文化大革命后来的发展过程看，可以推断：如果不整倒罗瑞卿，不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受阻，而且以后的若干重要步骤，诸如派工作组、军队院校的文革、部队支左等等，都必然会受影响，罗瑞卿必然是文革发展的负面因素。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整肃罗瑞卿，和整肃杨尚昆一样，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而抵制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则是毛泽东整肃罗瑞卿的最后的触发因素，是“压断骆驼腰的最后一根稻草”。

由于中共中央指控罗瑞卿的文件中没有列入“抵制文艺座谈会”，这一触发因素一直为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所忽视。

二、整肃罗瑞卿的非林彪的因素

当罗瑞卿已经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的时候，当整肃罗瑞卿已经成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条件的时候，林彪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到底是林彪主动向毛表示要整肃罗，还是林彪只不过在毛的安排下配合毛来整肃罗。对此，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有不同的看法。

早在1996年，海外学者泰伟思、孙万国在与国内党史专家们讨论后就提出了是毛要整肃罗，而指令林彪、叶群配合的说法。所谓叶群去杭州向毛诬告罗，其实是应毛的召见而去（18）。

在近期出版的《林彪画传》中，作者舒云更明确指出：“1965年11月，叶剑英突然又来到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再保对你没好处。”“毛泽东说：如果林彪身体不好，可由叶群代为汇报。”由此才有叶群诬陷罗瑞卿之事（19）。

本文在此不准备讨论林彪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本文认为：林彪因其特殊的地位，在罗案中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别人无法替代的因素。因为，不论林彪是主动还是被动、不论林彪是受到毛的诱惑还是胁迫，整肃罗瑞卿毕竟是由叶群代表林彪出面发难的。当然，中共官方现在对此有过分强调和夸大。

本文也不准备讨论周恩来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尽管这也是一个迄今为止未被涉及的话题。

本文要指出的是：除了林彪以外，还有不少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此，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红色家族档案》中写道：

“3月4日下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会议实际上成了批判斗争会。数月不见的与会者，原来都是爸爸最亲密的同志，他们或者是爸爸爱戴、尊重的上级，或者是爱戴他、尊重他的下级，现在都变成了路人或者仇敌。所有人都换上了一张完全不同的面孔，除了揭发罗瑞卿反党、反对毛泽东的问题之外，就是表示自己和罗瑞卿划清了界限。爸爸回忆当时的情况说：‘所有到会的人，不仅见面不打招呼，不讲一句话，都是以十分敌对的眼光望着我，太难受了’”（20）。

“三月会议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从发现爸爸比自己低贱的喜悦中得到在这个疯狂世界上继续生活的勇气。否则没有办法解释他们在这个会议上对待爸爸的态度”（21）。

虽然这里没有提到任何人的名字，但是我们从涉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材料中仍然可以找到一些线索来判断是哪些人。

例如，谈及罗瑞卿冤案的各方几乎都要引用林彪的《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主席：

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
敬礼！

林彪
11月30日

而且本文则注意到这封信还有另一个版本，在“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之后，还有一句话“（我才听叶剑英讲）”（22）。

泰伟思和孙万国早就指出：林彪决定向毛告罗的状，是在“一位‘中央同志’于11月底到苏州探访林彪，并且讨论了杨尚昆的问题”之后开始的（23）。

本文作者曾根据上述引用的林彪《关于罗瑞卿问题给毛泽东的一封信》的另一个版本认为：泰伟思和孙万国所说的“中央同志”就是叶剑英。

现在，舒云明确指出了：1965年11月，是叶剑英到苏州，向林彪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不要再保罗瑞卿了。同时，舒云还引用邱会作的回忆说：“1965年8月，叶剑英去看望林彪，……说林总，今天主席叫我来，罗瑞卿的事你以后不要管了，罗的事以后由中央解决”（24）。

在整肃罗瑞卿的整个过程中，叶剑英的作用是明显而突出的。尽管中共官方的《叶剑英传》、《罗瑞卿传》对于叶剑英在罗瑞卿冤案中的作用都只字不提，但是叶剑英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一些言行还是逐步被注意到。

华飞（25）、单世联（26）、丁抒（27）都根据张耀祠（28）、罗点点（29）、张佐良（30）等人的回忆指出了叶剑英在罗瑞卿案中的作用，举出了叶剑英在整肃罗瑞卿期间唱评弹、在罗瑞卿跳楼之后改词讥笑的事实。

1965年12月，整肃罗瑞卿的会议在上海召开。据《罗瑞卿传》的说法，“会议开始之前，常委中除毛泽东、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罗瑞卿”（31）。

罗点点的回忆使用了几乎相同的文字，但是在知情人中加上了周恩来：“会议开始之前，政治局常委中除毛泽东、周恩来、林彪之外，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与会人员被分批召到上海，开会时才知道是为了整总参谋长罗瑞卿的事”（32）。

如果说“与会人员”“大都不知会议的内容”的话，那么叶剑英、杨成武、萧华肯定是知道的。

舒云谈道：“罗瑞卿的一位部下这样回忆，1965年11月4日，叶剑英从杭州打电话叫我第二天坐飞机去见他，说事情很重要，但没有说什么事，说来了就知道了。第二天晚上下了飞机，叶帅已派车等在机场，然后把他接到空军疗养院，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和总政主任萧华都在。叶帅开门见山地说，家门不幸，罗瑞卿出问题了，一是要当国防部长；二是对林彪封锁消息，不汇报；三是折磨林彪，要不就不汇报，要不一说几个钟头，林彪在大连养病，罗瑞卿拿地图讲了很长时间，林彪直出虚汗；四是对林彪搞突然袭击，等林彪报告毛主席，毛主席定了就解决问题。说完，叶帅没有评论。我说，我回去对罗瑞卿采取什么态度呢？叶帅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第二天，我就坐飞机回来了。几天后，我随罗瑞卿去参加外国使馆举行的建军节招待会，路上，罗瑞卿气得鼓鼓的。原来是李作鹏几个找他谈工作，吵起来了。罗瑞卿还很奇怪，李作鹏过去不是这样嘛。我心里有数，李作鹏肯定也被打过招呼。果然，上海会议之前，李作鹏几个人拿出了一封诬告罗瑞卿的信”（33）。

上海会议期间“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而叶剑英却在会议期间的舞会上唱了评弹助兴（34）。

1966年3月，中央军委开会继续整肃罗瑞卿，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其间，罗瑞卿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就此写下了“将军一跳身名裂”的词句（35），对此罗瑞卿的女儿悲愤地写道：“这种愉悦，不是从迫害别人中得到，又是从何而来？不是纵欲后的满足，又是甚么？”（36）

会议之后，由叶剑英主持写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将罗瑞卿定罪为“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建议中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37）。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的该报告，下发到县团级。

罗担任的军委秘书长由叶剑英接任。以后叶剑英升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

中共中央对罗瑞卿的指控中具体地说：“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38）。

中共中央对罗瑞卿的又指控中说：“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39）。

对此，聂荣臻事后证实道：“（1）罗瑞卿对于聂荣臻主管的国防科委不支持，要人不给人，要钱不给钱；（2）罗瑞卿连同贺龙、刘少奇、邓小平等反对搞原子弹，攻击国防科委‘从资料到资料，从理论到理论，一事无成’，在困难时期有力量，就是不让搞，买东西也不给；（3）部院合并罗瑞卿搞个人野心，扩大自己的势力”“国防科研虽然受了罗瑞卿的恶劣影响，但还是取得了很大成绩，这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国防科研战线职工努力的结果。罗瑞卿在国防科研部门一贯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揭发批判罗瑞卿的错误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部分”（40）。

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回忆：大约5、6月间，中央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召开。会前，叶剑英、聂荣臻两位元帅在休息室聊天。我怕打扰他们，想退出，他们招手让我坐下。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41）。

聂荣臻以后升任政治局委员。

至此，本文认为林彪上述信中的“好几个重要的负责同志”中至少应该包括叶剑英和聂荣臻。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还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萧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其中谢富治的发言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萧华的发言题为《坚决保卫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同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的发言题为《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

从题目看，萧华、杨成武加给罗的罪名都是“篡军反党”，远比谢富治指控的“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要严重得多。而从张耀祠的回忆录看谢富治事先不知道上海会议的内容是整肃罗瑞卿，而杨成武则事先知情（42）。

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萧华、杨成武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是异常积极的。这些材料包括在罗被打倒以后，他们就此所作的自我标榜和吹嘘。只是他们在作自我标榜和吹嘘的时候没有、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自己也走上了罗瑞卿的老路，遭到整肃。更没有想到罗瑞卿以后还会平反、恢复名誉。

例如，萧华本人有个表白：“是批判斗争罗瑞卿时，多少晚上不睡觉，几天几夜不睡觉，搞材料，搞发言，组织会议，混在一起，所以把罗瑞卿斗垮了，我这个病又犯了”（43）。

1966年3月25日，萧华在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上的发言主要讲了两点：“第一，关于彭真在东北问题上的错误”，“第二，彭真在批判罗瑞卿会议过程中的表现”。萧华在讲到第二点时，指责彭真“不准写罗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等极不正常的关系”，“对杨尚昆的问题，办了两年没结果，就是因为彭、罗自己有鬼”。（44）

萧华明确指出：“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的关系就很不正常，和刘亚楼同志的关系也极不正常。当然，我们对刘亚楼同志的看法是一分为二的。刘亚楼同志是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也有个人野心，当了罗瑞卿的工具，直到临死才说出自己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瑞卿的当”（45）。

罗瑞卿专案组在1967年之初成立，一直是萧华主管罗案，直到萧华被打倒。1967年春夏间，在罗瑞卿腿骨伤不能行动的情况下，军事机关、公安部和高等院校仍然不断对罗进行大会批斗。那几个月罗瑞卿遭受大会批斗至少二、三十次。萧华对此当然要负一定的责任。

文革中曾任兰州军区政委的冼恒汉这样评价萧华：“回想起我和萧华以往的工作交往，感到这个人是不那么光明磊落。……众所周知他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46）。

尽管杨成武整肃罗瑞卿非常积极，但他认为还有比他更加积极的人。例如在他看来叶群、雷英夫、温玉成、邱会作、吴法宪都比他更加积极。然而在文革结束、罗瑞卿平反恢复名誉以后好多年，杨成武拿出那些人的“更加积极”来为自己的“非常积极”辩护，甚至不承认自己当年“非常积极”，把自己的“非常积极”说成仅仅是“不表态是不行的”、“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而且还把自己的责任推给王尚荣、雷英夫（47）。对此，余汝信专门写了《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一文加以澄清（48）。

该文首先指出：杨成武对整肃罗的上海会议并非“事前毫不知情”，而舒云谈道的“罗瑞卿的一位部下的回忆”则更进一步证实，杨成武不仅事先知道上海会议要整肃罗瑞卿，而且参与会议的准备工作。

该文其次驳斥了杨成武说的1966年3月自己在批斗罗瑞卿的会议上，“许多同志发了言，我和王尚荣、雷英夫作了联合发言，稿子是王尚荣、雷英夫写的，那时不表态是不行的。这个发言有过头话，但还是留有余地，……”该文提到了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传达的杨成武与王尚荣、雷英夫的联合发言，提到了杨成武1966年5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提到了1967年3月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发言，集体引用了这些发言的原话，认为“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批判性语言，哪有一丝一毫‘留有余地’的味道？！”

整肃军委办公厅主任萧向荣是整肃罗瑞卿的先兆，萧向荣倒台以后，杨成武接任了军委办

公厅主任。罗瑞卿倒台以后，罗担任的总参谋长由杨成武接任。

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等也是积极参与整肃罗瑞卿的人，尤其是雷英夫“在林彪、叶群向他交底之后”，便“主动”写了揭发罗瑞卿的材料，由叶群向毛泽东递交。罗瑞卿的女儿后来说“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49〕

以后，雷英夫又参与了编造“诬陷刘少奇”的材料，事见余汝信的《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50〕

属于林彪集团的吴法宪也参与了整肃罗瑞卿，而吴法宪也举出了许光达积极揭发罗瑞卿的例子，说：罗瑞卿对许光达的揭发“很吃惊，也很生气，但是却敢怒不敢言”〔51〕。

三、未完成的结论

至此，本文讨论了“罗瑞卿遭整肃的几个关键因素”并且得出了以下结论：

（1）罗瑞卿遭整肃的第一关键因素是毛泽东，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罗瑞卿已经成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而触发因素则是罗拒绝了江青要求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建议；

（2）除林彪集团以外，叶剑英、杨成武、聂荣臻、萧华以及其他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所起了大小不等的作用，其中尤以叶剑英、杨成武为突出。

本文尚未讨论的因素有：

（1）周恩来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一个至今未被提及的话题；

（2）林彪集团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作用无疑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但同样无疑的是中共官方的说法不成比例地加以夸大了这方面的作用，对此因该有一个客观的描述；

（3）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以后被毛泽东定为“走资派”的人在整肃罗瑞卿的过程中的所作所为。这些人的言行只是被零星地提及，尚无深入的讨论。按照麦克法夸尔的说法：整肃罗瑞卿的材料有许多明显的歪曲，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等人完全有能力联手起来质疑这些歪曲的，但他们没有这样作。以后的事实证明这是他们遏阻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次机会”，而失去了这个机会〔52〕。这也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的话题。

注释：

〔1〕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三版）（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页75—76

〔2〕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海口：南海出版公司，1999）页186

〔3〕关于“林彪并不十分情愿”的细节，见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页101：林彪起初和罗瑞卿一样，认为“方向问题已经解决了，主要是艺术水平问题”，后来“江青搬出了毛泽东的批示，林彪不说话了。”其更详细内容辨析请参阅：余汝信：《到底是林委托，还是毛委托？》陈昭：《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剖析》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

〔4〕原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赤胆忠心，奋斗不息〉，载《解放军报》，1978年8月15日

- (5) 刘志坚：《风雨征程——刘志坚回忆录》（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96）页206
- (6) 黄瑶《罗瑞卿》，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6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页60
- (7) 黄瑶、张明哲：《罗瑞卿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
- (8)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页1330
- (9) 同（8）
- (10) 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第六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又见：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等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 (11) 同（7）页427
- (12) 罗瑞卿：《军队文工团必须树立优良的作风（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二日）》，《罗瑞卿军事文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又见：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文革串连”等编《罗瑞卿反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
- (13) 同（8）页1331
- (14) 同（7）页427
- (15)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1966年5月16日 中发（66）268号文件
- (16) 同（15）
- (17) 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页421
- (18) Frederick C. Teiwes and Warren Sun: The Tragedy of Lin Biao,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6), 30
- (19) 舒云《为林彪元帅辩护》载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纽约：明镜出版社，2007）
- (20) 同（2）页212
- (21) 同（2）页210
- (22)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23 该书注解指出资料来源为哈佛大学所藏王年一手稿
- (23) 同（18）页29
- (24) 同（19）
- (25) 华飞：《军事林彪和政治林彪》，载《华夏文摘增刊》，2002年11月18日（zk0211c）
- (26) 单世联：《眼底吴钩看不休》，载《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1月27日（zk0301c）
- (27) 丁抒：《毛泽东文革初期在军内的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华夏文摘增刊》，2006年10月25日（zk0610f）
- (28)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北京：中共中央党史出版社，1996）
- (29) 同（2）
- (30) 张佐良：《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 (31) 同（7）第540页
- (32) 同（2）第190页
- (33) 舒云：《大将罗瑞卿和1965年上海会议 》
- (34) 同（30），页63
- (35) 同（25）

- (36) 同(2), 页216
(37) 同(15)
(38) 同(15)
(39) 同(15)
(40) 聂荣臻:《在1967年3月25日和叶剑英会见国防科委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讲话》
转引自宋永毅:《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1) 同(19)
(42) 同(28), 页29—30
(43) 萧华:《在军队院校在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67年1月6日)》载宋永毅主
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44) 转引自余汝信:《1966:正本溯源说〈通知〉》载《华夏文摘增刊》2003年9
月16日(zk0309d)
(45) 转引自余汝信:《文革初期空军党委三届十一次全会考》载《华夏文摘增刊》2007
年5月8日(zk0705b)
(46) 冼恒汉:自述 《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见“林彪网站”[http://www.
linbiao.org/forum](http://www.linbiao.org/forum) 以及冼恒汉的女儿冼玲的博客 [http://
9link.116.com.cn/node/30130](http://9link.116.com.cn/node/30130)
(47) 陈虹《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载《华夏文摘增刊》2005年12月19日(z
k0512d)
(48) 余汝信《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2005年12月1
9日(zk0512d)
(49) 同(2), 页183—184
(50) 余汝信:《在雷英夫未被追究的背后》载《华夏文摘增刊》二〇〇五年七月六日(z
k0507c)
(51) 吴法宪:《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页563
(52) 同(22), 页26

~~~~~  
【研究动态】

20世纪60年代战备问题研究述评

• 刘国新 •

战备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上作出的重要战略决策,战备问题则是影响20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事件,因此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水平确有进行一番梳理的必要。由于本次年会设定的题目只是60年代的战备,不包括70年代及其以后,在叙述对象上不免有所局限,因为真正有争论或意见存有分歧的恰恰是70年代发生的那些事。另外,还有专人负责撰写三线研究综述,这就使本题目的写作进一步受到局限,因为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是分不开绕不过的,二者的厚薄关系是呈反比的。

一、关于研究现状

战备问题是国史中的重要问题,但学术界对战备问题的研究成果却显得不那么丰厚。从论文的数量看,目前能检索到的不超过20篇,主要有:郑谦的《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刘志男的《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新文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

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综述》、杨贵华的《怎样看待全国性战备及其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影响》、徐奎的《理性的认识和思考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全国大备战”》等。连同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内（指关于研究“三五”计划的经济史文章和研究建国以来军事战略的文章），也不过三四十篇。在这不多的成果中显出这样两个特点：一是发表研究论文的时间比较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二是发表研究论文相对比较集中的刊物是《当代中国史研究》。

至于战备问题的专著则告阙如。有一些著作如于化民、胡哲峰的《当代中国军事思想史》、王普丰等的《现代国防论》、陈维民、张景敏的《时代的抉择》、宫玉振的《中国战略文化解析》、楼耀亮的《地缘政治与中国国防战略》、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姚有志的《毛泽东大战略》、金钿主编的《国家安全论》以及《当代中国》丛书的国防和军事类卷中的《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当代中国军队的后勤工作》、《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海军》、《当代中国空军》、《当代中国的兵器工业》等或从国防战略的角度，或从外交关系的角度，或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涉及或提及战备，但都不属于专门的战备论著。

此外，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综述类专著。较早一点的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编、杨先材主编的《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这本书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分期标准，一共列了 45 个专题，内容比较齐全，但缺少了关于战备问题的专题。晚近出版的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编、郭德宏主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一书，列了 22 个专题，数量上虽不及前者，但时间跨度长，从建党到 21 世纪初，题目也都比较大，每一个专题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时期，作者都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时期的作者是邵维正、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作者是王海光、关于共和国经济史的作者是董志凯。因此，这本书在研究述评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是一些高校研究生的指定阅读书。遗憾的是这本书同样没有关于战备的专题综述。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分析起来有两点：一是战备问题首先是军事问题，军事准备、军事部署都带有一定的保密性质，有些材料至今仍未解密，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研究的深入开展；二是三线建设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战备问题研究。三线建设与战备问题密切相关，相比之下，如果把战备当作一种指导思想、一个政策选项的话，三线建设则是它的具体措施，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因此，研究三线建设无论从材料的实证性还是从问题的切入点都较之战备问题更具基础性和操作性，研究起来更容易一些。目前的状况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判断。比如，所有的经济史类专著都有专章叙述三线建设，因为三线建设牵涉到工业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再比如，前述所提到的两本综述专著均对三线建设有专门的论述。在《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研究综述》中的《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研究综述》一文中，刘友于以序号作标题论述了三线建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研究的新进展》中的“关于共和国经济史”中，董志凯以《西部开发问题的历史启迪》为题详细分析了三线建设的利弊得失。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数百倍于战备问题，约有 1160 多篇，其中仅综述、述评的文章就有七八篇。

## 二、若干有争论的问题

### （一）关于战备形势的判断

对于 20 世纪 60 年代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研究者是存在不同判断的，从而透视出战备在当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与否的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当时的决策者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杨奎松在《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的第十八章中对此有所论述。这一章无论是就全书的比例而言还是相对于这段历史的长度和复杂性而言都稍显单薄，但作者仍然用不长的篇幅作出论断。他认

为，当年的决策者没有能够预见它（指战争气氛）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当战争气氛发展到高度紧张的程度之后，又未能抓住机会，有效地缓和局势，反而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过分的反应。“甚至，即使在事态渐渐缓和下去之后，毛泽东也丝毫不认为战争危险已经过去，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大批重工业工厂和研究部门被迁到内地可以防空的大山中，无数的资料和人力被浪费在城市的‘深挖洞’里……”。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叶晖南。他认为，由于国家倾全力进行备战，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是，这个战略方针是建立在对形势判断失误的基础上的，因而其负面影响亦显而易见”，“而且这个战略方针实施的时间贯穿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整整20年，其中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最甚，军费开支的加大，军队员额的激增，加上‘一切以战备的观点来衡量’的思维定式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落后局面。经济建设的落后又反过来影响到国防建设，虽然战略武器搞上去了，但常规武器又重新同世界先进水平拉大了距离。同时，国防建设本身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受到很大损失”。

胡哲峰的观点与此不同。他认为，自60年代中期，我周边形势和国际形势严峻，除东南方向台湾蒋介石集团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美国在越南扩大战争，轰炸越南北方，威胁我南部边疆，苏联则在中苏、中蒙边境大量增兵，威胁我北部边疆。一时间，高天滚滚寒流急。鉴于这种形势，中共中央军委不得不作出相应反应，要准备打仗。更多的学者是同意这个观点的。他们认为，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等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决策，不是头脑发热。60年代初，国际上出现了反动势力联合反华的严峻形势，我国东、西、南、北都受到军事威胁。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因素的估计越来越严重，不断加强加强战备工作。

郑谦没有从总体上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是做了一定的区隔。他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边境出现了紧张局势。1962年10月，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全面进攻，中国军队被迫自卫还击。同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也企图利用大陆的暂时困难叫嚣“反攻大陆”。1962年以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在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威胁。这一系列严峻的事实，迫使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把国家安全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加以考虑，不能不高度重视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但他又指出，1969~1970年间，中共九大前后，出现过一次遍及全国、规模空前的战备高潮。战备工作超出了常备型的轨道，很快进入突击性的高潮阶段。这次高潮的出现，反映出对战争形势过于严重的估计。其影响巨大，在“左”的思想下，特别是由于林彪、江青集团的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在经济生活中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浪费，在政治上助长了当时已经很严重的阶级斗争扩大化。

与上述从军事战略和军事方针的角度考察战备问题不同，刘志男以大国间的关系为纵轴、以中国的国家利益为横轴，在世界历史坐标中研究战备问题。他在考察了60年代末中国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之后指出，从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未来敌人的军事战略思想、敌人有可能进攻的方向以及中国战略后方建设、国防科技和人民战争等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作出了大量富有战略眼光的决策。几十年领导武装斗争的经历，使得毛泽东首先要从战略的高度上考虑问题，在加强战备制止战争以及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胜利这些涉及国家安危的根本问题上，他既强调要加强对战争的物质、精神准备，制约乃至最终制止战争的爆发，又号召一旦反侵略战争打响，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要在捍卫民族利益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对来自不同方向的侵略者打一场人民战争、彻底消灭强大的敌人。作者得出的结论是：“既然战备关系着祖国的安危，而祖国的安危又影响着世界的格局，那么，在分析和研究世界战略格局之所以得以建立、中国外交在70年代后进入‘大踏步前进的时期，在世界舞台上，中国更加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产生原因时，难道不应更全面、更深刻地认

识外交战略的挑战与加强战备之间存在着相互呼应、相互联系的必然关系吗？换言之，1969年‘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难道不是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提供了牢固的物质基础吗！？更进一步说，对美苏关系的研究与调整，难道不是中国军队战备工作的必然延续吗！？”

## （二）关于战备口号的由来

所谓战备的口号是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么，这个口号是怎么形成的？陈东林认为这个口号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毛泽东说：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张，把老百姓搞翻了不行，这是个原则问题。总之，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陈文进一步引证说：“1966年3月，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作了高度概括，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廖述江的《“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由来和历史演变》一文考察了这个口号的形成过程，认为最早提出这个口号的是周恩来。文章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指示说：计划要考虑三个因素，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家计委又对“三五”计划的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于7月21日向国务院做了汇报。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讲话说：“主席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把他合在一起顺嘴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的最早提出。

究竟陈东林和廖述江哪个说法更准确呢？廖述江观点有《周恩来年谱》做有力的支撑。

据查，《周恩来年谱》8月23日条是这样记述的：“主持国务院第一百五十八次全体会议。在讨论长期规划问题时，把毛泽东提出的‘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并分别阐述了三者的内容和相互关系。指出：备战、备荒，落实到为人民，要依靠人民，首先要为人民，为人民是最基本观念，任何事情要想到为人民，人民是力量的源泉。‘备战、备荒、为人民’是一个整体。备战是阶级斗争，包括国内国外的。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使工农业真正过关。一切靠人民、为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这是最可靠的。”这一段记载证明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确实是周恩来概括出来的。除此以外，这段话还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内容，即周恩来不但将毛泽东的三句话做了“顺嘴”的概括，而且还对三者的关系做了简单明了的论述，得出“备战是阶级斗争”，“备荒是同自然作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的结论。正是周恩来创造性地发挥了毛泽东的战备思想，才使得战备口号言简意赅，能够令广大人民群众更为切实地理解它的精神实质。这一重要内容，无论是陈文还是廖文都没有征引。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传》也印证了《周恩来年谱》的说法是对的。书中讲：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彭真、李先念、薄一波等，听取余秋里、谷牧关于“三五”计划和三线建设的汇报。毛泽东认为“三五”计划投资项目多了，指标也高了。他说：我看五年搞1080亿元的建设规模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成为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乃至社会主义建设工作所遵循的指导方针”，这就把口号形成的问题完全说清楚了。

关于此问题还留下一个有待于进一步弄清楚细节，即战备口号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哪个指示概括的？《周恩来年谱》讲是根据“毛泽东‘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得出的，而《毛泽东传》说是根据“第一是老百姓，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这三句话得出来的。两个权威的著作各执一词，令读者莫衷一是。看来最终搞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文献资料的再开发和再利用。

### （三）关于“三五”计划

按照最初的设想，从1963年开始编制十年规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三五”计划的目标就是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把解决人民吃穿用的问题作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这在某种程度上带有调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性质”。由于美帝国主义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和轰炸越南北方，全面发动了侵越战争，把战火烧到中国的大门口。针对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毛泽东提出要防备敌人的入侵，要有战略后方。工厂不能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要抢时间把工厂迁到二、三线，集中力量建设三线。这样，“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就由原定的解决吃穿用转向以战备为中心了。

如何看待增加了战备内容的“三五”计划，有的著作对于加快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对基本建设投资进行相应的调整是持肯定态度的。有的著作认为“三五”计划不是一个高指标的计划，基本建设投资预算从1080亿元减少到850亿元，虽然在实际建设中被大大突破至976.03亿元，但比“二五”时期的实际投资1206.09亿元还是少了许多。投资方向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安排顺序由农轻重转变为重农轻。重工业408亿元、国防工业87亿元、交通运输133亿元，三者合计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由原来的20%降至14.1%；轻工业37.5亿元，占4.4%。另外，各项指标也定得较低，留有余地，因此没有出现“大跃进”期间竭泽而渔的情况。还有的著作也认为从总体上看，“三五”计划着重改变工业的布局，强调加强内地建设，在当时还是必要的，其主要指标也是留有余地的。但同时认为，“三五”计划是在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局势严重性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因此在内地建设安排上存在着过急过快的问題。

评价“三五”计划的复杂性在于该计划刚刚起步不到一年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文革”初起之际对于经济建设的冲击是公认的事实，即便是对“文革”时期经济发展持基本肯定观点的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也不例外。但怎样具体分析还是有一些差异的。有的著作在总体上作出一个价值判断：从1966年6月以后，我国进入了“文革”时期，混乱局面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挥失灵、生产停滞的现象不断出现，经济领导部门忙于应付，连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也不能按时制定。到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过之后，全国形势逐渐平稳，但各种运动不断，难以恢复正常秩序。更多的著作是把“三五”计划分成不同的小阶段具体分析。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提出，“文革”的发动对1966年经济的影响“总的说来，仍然带有局部的性质，动乱主要集中在上层建筑领域，真正影响到经济领域特别是基层的工作是在第四季度开始的”。该书同时还指出，之所以说是带有局部性质，是因为：第一，前几年生产建设的成就为1966年的经济发展准备了比较雄厚的基础；第二，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各项具体经济政策和规章制度仍得到继续执行；第三，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怀疑、抵制这场动乱。所以，1966年的经济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完成或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这一年的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327亿元，超额10.2%完成年度计划，比上年增长17.3%。国家财政收入558.7亿元，比上年增长24.4%，支出541.6亿元，收大于支17.1亿元。这个观点被不少后来出版的经济史专著所接受（如董辅初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对“三五”计划造成冲击的是1967和1968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两年动乱的严重后果是：生产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减少，市场供应紧张，文教事业备受摧残，国民经济全面衰退，国家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1967年工农业总产值2015.3亿元比1966年下降将近10%，1968年在1967年下降的基础上又下降了4.2%，只为1966年的86.6%。财政收入1967年为419.4亿元，比1966年减少139.3亿元，减少幅度达25%，1968年比1967年又减收了58.1亿元，减少13.9%。连续两年的政治大动荡，导致经济连年下降，1968年降到了“谷底”。如果以1953～1965年1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实际增长速度7.9%计算，1967年和1968年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应达5220亿元，而实际这两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4119.8亿元。两年中损失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100亿元。按照“三五”计划国防工业三线建设的部署，到1970年要新建29个生产基地、400个工厂。实际到1968年下半年，正在建设的只有20个基地，其中已开工的只有116个工厂。本应该在1970年全部完成的这些“三五”计划三线建设项目。因为“文革”的前三年动乱，被迫推迟到“四五”计划期间，失去了宝贵的两年以上时间。1969年国内政治局面逐步趋于稳定，周恩来重新组织编制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结束了两年经济发展无计划状态，基本上刹住了生产下降的趋势，1969年经济开始回升。

有的著作作用经济发展总量的周期波动趋势对“文革”时期经济做综合性描述，其中涉及“三五”计划。韩孟在《“文革”时期国民经济短期波动》中指出，1966～1968年，国民收入环比增长率分别为17、-7.2、-6.5，呈古典波形。全波共6年，高潮4年，低潮2年。1966年处在4个高潮年份中的最后位置，是经济上升的一年，是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门红，是“文革”时期我国经济三起三落中的“首起”。1967～1968年都是低潮年，1968年成为“首落”的低谷。还有的著作对“三五”计划作了如下的概括：“三五”计划总的说呈现了“起（1966）——落（1967、1968）——起（1969）”的跌宕起伏状态。1966年，出现了预计提前两年完成计划的良好发展势头。1967、1968年“文革”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计划完成情况连续出现倒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1969年中苏边界武装冲突使全国进入了战备高潮，“三五”计划以临战的非正常状态取代了前三年无政府主义的非正常状态。1970年的高投入使原定指标较低、本可提前两年完成的“三32”计划勉强完成，但也埋下了“三个突破”的危机。这个概括笔者以为是站得住的。

#### （四）关于“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是否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一号命令”是指1969年10月18日，林彪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发布的“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后中共中央文件称“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80年代出版的一些著作都把“一号命令”与中央领导人的疏散相联系，同时把它作为林彪迫害老干部的罪证。事实上，林彪的“一号命令”与中央疏散老干部的决定不存在因果关系，最早对此提出辨误的苏采青撰文指出：林彪的“一号命令”不包含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疏散中央领导人是毛泽东决策、周恩来主持安排经中央讨论通过的，下放知识分子干部和文教单位一事也是根据毛泽东“认真搞好斗、批、改”的空想进行的。

据考证，林彪的“一号命令”的确没有疏散中央领导人的内容，林彪是10月18日（这天是星期六）疏散到苏州的，到达当天他就给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共6条，主要内容有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通讯联络要经常畅通。国防工业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



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由此可见，“一号命令”确实是关于军队临战部署的文件，其中没有疏散领导人的内容，更没有下放干部的内容了。当然林彪在发布这个命令之前，未征得军委主席毛泽东的批准，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非同小可。试想，当晚，“一号命令”迅速用电话转达到全军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而作为统帅的毛泽东还不知晓。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林彪的个人野心，但这属于另外一个问题了。

再从时间上看，也能说明疏散中央领导人和下放干部与“一号命令”无直接联系。中央关于疏散领导人的通知是10月14日晚发出的，该通知要求老同志于20日之前全部疏散。而“一号命令”是18日发出的。疏散通知在前，“一号命令”在后。至于下放干部，早在1968年9月7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就在社论中发出了完成夺权的同时就标志着整个运动已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斗、批、改”当中就包括“下放科室人员”。同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社论，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在当时，干部下放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早晚要发生的事了。这些都在“一号命令”之前。

1999年7月，笔者主持了有国内研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专家以及亲历了战备决策和事件的老同志参加的“关于六七十年代战备问题的回顾与思考”学术圆桌会。会上就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原总参作战部的老同志以当事人的身份把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作了介绍，有关学者从学术角度进行了论证。会议得出的结论是“一号命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以及下放干部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近年出版的传记书已经不再把“一号命令”与疏散老同志和干部下放相提并论了，比如2001年出版的《李富春传》、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2005年出版的《陈云传》、2006年修订版的《朱德传》都作如是观。但是早一些时日出版的传记书仍坚持此说，比如1992年出版的《刘伯承传》、1994年出版的《聂荣臻传》。最近该书的修订本亦未有所纠正。

#### （五）关于对60年代战备问题的评价

学术界的基本认识是：战备是根据国际形势的需要作出的正确决策，是毛泽东这一代领导人从国家安全考虑出发作出的重要战略决定。至于战备的作用，可以概括为这样几点：

第一，战略目的达到了。当时北边、南边都紧张，没有准备是很危险的。后来没有打起来，是因为充分准备的结果。当时敌人不敢对我发动大规模入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战备。“不战而屈人之兵”，从这个意义上看，战备达到了目的。

第二，促进了国防尖端武器的发展。这期间原子弹、氢弹相继发射成功，核潜艇、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中远程导弹、洲际导弹相继完成试验，使中国的战略武器进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不仅大大提高了中国军队的装备水平，打破了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核威胁、核讹诈，而且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至今仍是我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大、小三线建设改变了中国工业布局，是一次大的经济调整。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性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时期。军事工业70%放在三线，牵动了化工、原材料及部分消费市场，如西南铝加工厂当初就是为飞机制造基地建的，后来可以生产737飞机大梁。这些项目对内地建设都有促进作用。

第四，战备不仅对工业有促进作用，对屯垦戍边也都起了作用。反过来，屯垦戍边也有有力地配合了战备，在1962年的新疆伊塔事件和1969年的黑龙江珍宝岛事件中生产建设兵团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战备使全国人民经受了一次实际锻炼，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国防观念，不失为一笔宝贵的财富。

关于战备的局限性，有人认为主要有如下表现：一是当时强调从最困难处着想，从最坏处做准备。但凡事都从最坏的估计出发去指导工作，并不是十分科学的，它降低了预测概率的科学价值，必然使国家的全部工作发生偏差。二是过于强调“临战状态”和全民总动员，对国家经济的负面影响也不能小视。主要表现在从“七五”计划的最后一年到“八五”计划的前两年，但那已不是60年代的事了。三是三线建设存在急于求成、违背经济规律和片面强调成龙配套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专门的题目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 三、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对战备问题的研究远远不够，迫切需要进行全方位系统的梳理。如果仅仅从60年代的战备出发，以下的几个问题似可加强。

#### （一）就宏观视角而言

第一，从战略决策及其实施的角度看，60年代战备与“文革”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做的大题目。周恩来曾讲战备是阶级斗争，那“文革”更是阶级斗争。战备主要是对外敌入侵的准备，“文革”主要是要解决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两者都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那么，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呢？至今尚未看到有专门的研究。毫无疑问，厘清两大事件不仅是历史本体论的问题，还有历史认识论的问题，至少对于把握毛泽东的思路是有益的。战备工作从1964年开始部署，发生在前。“文革”1966年爆发，产生在后。“文革”是一场内乱，特别是在最初的两年，对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那么，它对战备工作又有哪些影响呢？笼统地讲缺乏说服力，应该有具体的实例和量的分析。“文革”中，林彪、“四人帮”集团利用了领袖人物的错误，推波助澜，干扰破坏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样，他们在战备问题上又有些什么样的活动，达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也是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第二，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战备与农业的关系值得关注。战备对工业的影响已经研究得比较充分了，很多著作指出战备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揭开了西部开发的序幕；中国经济布局的战略展开是在“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建设为缩小城乡差别奠定了基础等等。但是相比之下，战备对于农业的影响的研究则显得很不够。一方面，战备对农业、粮食的需求加大了，三线建设的展开无疑加剧了粮食供需矛盾；另一方面，“三五”计划对农业的投入减少了，仅占百分之十几。当时，搞得如火如荼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是在国力有限的条件下依靠自力更生发展农业、发展粮食的，“文革”期间也一度对农业投入有所倾斜。但是这些决策都不是战备本身的产物，因此，战备对农业究竟是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是需要加以认真研究的。战备对农业经济体制有没有影响，影响是怎样的？也要有所回应。

#### （二）就中观视角而言

第一，关于“北顶南放”。就已有研究成果看，对“北顶南放”的解释不尽相同。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方针主要是针对美国可能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我国实施的大规模入侵。“北”即北面越过

“三八线”经朝鲜侵略我国东北；或沿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老路，突入渤海湾直插京津一带；或从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入侵，造成分割中国南北的态势。“南”是入侵两个方向：一是以台湾为跳板，进攻中国东南沿海各省；一是从越南和我国南海方向向我国两广地区侵略。也有的解释为“北顶”是顶苏联，“南放”是放美国，这不仅反映了军事战略防御的重点是防苏，是对以往的战略防御重点作出的重大调整，而且体现了在外交上以对美为主转为对苏为主的策略方针。除此以外，“北顶”顶到什么程度，“南放”放到什么地步，都需要有明确的界说。关于“顶”，毛泽东就有自己的理论，他认为：“顶”，要顶一下，顶不住还不是走？不能放在顶得住上。“顶”的定义不是死顶、死守。这样，“顶”和“放”的区别应该怎样理解？

第二，所谓“北兵南调”问题。究竟有没有这么一回事？目前连基本情况尚不清楚。有人说根本就没有“北兵南调”，倒是有“南兵北调”，从广州调兵去了东边的舟山。也有人指出，当时曾有过将北海舰队调往南面的打算，但实际上没有调。从逻辑上讲，60年代中期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的规模，战火有进一步烧到中国边境之虞时，中国采取相应的军事对策，抽调北边的部队南下还说过去。可到了60年代末中苏边境发生战争，北边的压力明显超过南边，中国却“北兵南调”，难道不令人匪夷所思吗？还有一种说法，即把“北兵南调”同林彪搞阴谋扯到了一起，这就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如果此说成立的话，那么就要进一步证明林彪的政变阴谋不是发生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而是提前到了60年代末；不仅仅是政变阴谋，而是到了调动军队的严重地步。总之，这个问题亟待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弄清基本史实。

□ 《中国当代史研究》2007年第6期

~~~~~

【回首文革】

父亲刘仁静在“文革”中

• 刘文澜 •

1967年上半年，当时“文革”在全国风起云涌，每个中国人都身不由己地置身其中。父亲刘仁静由于历史原因，历次运动屡受批判，此次当然也在劫难逃，受到批斗、抄家、勒令打扫胡同等“待遇”自不在话下。最后更因他在胡同口揭下一张炮轰刘少奇的大字报，想带回家细看（因父亲1950年去北京，刘少奇曾代表党中央接见过他。）而被红卫兵殴打，并于6月被公安部以“反革命”罪逮捕，罪名是“有颠覆政府的活动”。此后我接到母亲来信告知此事，感到非常震惊。这时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母亲今后怎么办呢？”

当时弟弟在南京某厂任厂长。尽管从他参军再转业到南京，他一直极力在政治上和父亲划清界线。然而“文革”中还是被对立一派以家庭出身为由被揪了出来，还一度关在水牢里。

这时母亲的处境十分困难。老伴被捕，儿子久无音信，女儿远在上海。没有生活来源，孤零零一个人，还要面对邻居的异样目光。她向户籍警要求来上海，回答是“不同意”。于是我只好从每月微薄的工资中挤出20元寄给母亲，逢年过节另加5元。如此苦苦捱了几年。1971年有关方面终于同意让她来上海，母亲就把抄家残余的衣物一股脑儿都带上南下。虽然我家很小，又有孩子，但总算也是亲人团聚了。

谁知1972年4月我们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要求母亲回北京照顾他的生活。这一来母亲想不通了，她说：“没听说有老头子坐牢，还叫老太婆作陪的，我不去。”此后父亲又来了第二封，第三封，内容和第一封都差不多，母亲还是不去。再后来，上海的户籍警都上门来催了，母亲气得生病。在这种情况下，我对母亲说：“你不要急，我陪你一起回北京，看看究竟是怎么

回事。”接下来我忙着向单位请假，安排好家里，终于陪母亲一起回到北京。到达后即有公安部代表找我们谈话，再三叫母亲不要有顾虑，“你是自由的，可以随意出入……”此后又安排小车，送我们到延庆某劳改农场去见父亲。就是在那里我们第一次见到所谓“独院”。那是一个小院子，地处农场一个角落里，内有两间平房，另加一间小厨房，一间厕所。看守人员住在对面，约有两三间房屋，他们另有出入通道。而父亲没有“陪伴”是不能出院子门的。当然外面还有农场高高的围墙、哨兵和电网。我们到达后，该农场的教导员和另一领导也来看望我们，除了向母亲交待一些生活上的具体事项，诸如以后每月会发多少生活费等，也谈到父亲在那里的生活和劳动情况。“劳动”，我一听就睁大了眼睛，当时父亲已经年过七十，他能干点什么呢？只听他们很认真地向我们介绍，“我们和他一起劳动的，就在院子里，一个人松土，一个人挖坑，他拿一个小篮子，往每个坑里放一粒种子，另一个人再盖上土……”原来如此，我听后有点哭笑不得，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干部走后，我和母亲开始问父亲这几年的遭遇，他似乎不想让我们担心，只简单地说：“遭遇过武斗，最初关在秦城……”还有就是上面要他写交待，他已写了很多交待……看见母亲情绪趋于稳定，而我请假的日子有限，没过几天我就匆匆回上海了，但也正是这次北京之行给了我一个机会，有关方面等于默认了我可以去京探望父母。

此后几年中我几乎每年尽量在节假日上班，再和同事调换值班日期，以凑上八、九天假期好去北京探亲一次。印象最深的是1973年北京之行。那次我仍然去延庆农场，场方还派了一个工作人员到车站来接我。到达的第二天，我看见看守把父亲带到他们办公室，说是有人要找他谈谈，去了一个多小时后，父亲回到自己这边，他的神情平静，默不作声。我问：“人家找你干什么？”他说叫他再写些东西，我说：“那你要写吗？”他谈谈地说：“再说吧。”此前辗转听人说起，毛主席曾有一段指示，提到父亲的名字。当然原话是不知道的，也没地方去打听，大意好像是“……像刘仁静这样的老托派就不要关了吧……”但此事因没法确认，我没敢告诉父母。当时我看看父亲，又看看母亲，她脸上有种期盼的神情，不知怎么，我竟脱口而出，对父亲说：“让我来代你写好吗？”父亲无所谓地说：“好啊，你来写好了。”父亲既然同意，我说干就干，找来两份《人民日报》和一本札记（父亲看报时有随手记一点札记的习惯）写起来。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觉得可笑。我对父亲的思想了解甚少，他在想什么，我其实是一点也不知道的。话又说回来，即使时至今日，又有多少父母会对自己的孩子倾诉自己的思想和困惑呢？但当时我很天真地想，说不定写的东西通过了，“最高指示”得以落实，父亲也就可以恢复自由了。

我记得当时把两份报纸东抄一段，西抄一段，又把父亲的札记摘录几段，穿插其中，东拼西凑，交给父亲，让父亲抄一遍交差。此后没过几天，我就回上海了。这份假检查的效果如何我无从知晓。但后来隐约听说，领导对父亲说：“这不是你写的。”反正我只知道过了一段日子，父母被搬到团河农场还是一个独院，但环境好多了。院子坐落在一片树林边，看守的人也由五、六个减为两个。我在那里也住过两次。再后来又搬到北京近郊少管所外围一处闲置房屋内，看守好像只有一个人，而且经常不在。听母亲说，这位看守也姓刘，他很“大方”地对父母说：“这院子门就不关了，我不怕你们跑。”而父亲幽默地回应道：“干吗要跑，这里有吃有住，蛮好嘛。”在少管所期间，父母的境遇又有所改善，每逢我去，居然还派车送我们到京郊一些名胜去游览。至于写检查，就我所知，后来次数也减少了，而其结果还是没有通过。听说在延庆时，找他谈话的人有一次气呼呼地说：“要不是看你是‘一大’代表……”不过在我记忆中父亲不管在哪里神情都是那么平静而又沉默。现在想来老人自有自己的信念和为人原则。他认为自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事早在1950年来京时就公开承认了错误，而且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还加上了措辞严厉的“编者按”。如今旧事重提，要他为了自己能早日重获自由，就给自己再扣上几顶大帽子，或者无限上纲，口是心非地就此“认罪”。显然在他是想不通也难以接受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从我送母亲回京算起，又是6年过去了。终于迎来了1978年，神州大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指引下如沐春风。划时代的变化开始了。夏末，母亲来信说公安部在北京的江苏饭店宴请二老，席间宣布父亲自由了，回原单位（仍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翻译）。至此长达12年的“监护”生活终于结束。

又过了8年，1986年，中央统战部找父母谈话，通知他将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10月任命正式下达。对于时年84岁的父亲来说，这似乎是一个迟来的好消息，但毕竟是党落实政策的体现，对父亲也是一种安慰。只可惜好景不长，1987年8月5日清晨，父亲因车祸不幸逝世，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就这样默默走完了自己的路。

父亲逝世后，由人民出版社和国务院参事室共同在八宝山为他举行了追悼会，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8月12日《人民日报》和全国各大报纸对此都作了报道。

□ 《世纪》 2008年第1期

~~~~~

## 【年终盘点】

### 2007年与文革有关的十件事

• 樵 余 •

年终盘点，也学着时下一些评选或总结“十佳”、“十大”之类的做法，把一年来有关文化大革命印象较深的事总结出十件如下，供有兴趣者参考。

一，涉及文革内容的书籍被查禁。新年伊始，就传出新闻出版总署查禁一批书籍的消息。遭禁的作品包括描写一批著名戏剧艺术家坎坷人生的《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从个人经历视角讲述自辛亥革命到大跃进的中国历史变迁的《沧桑》（作者晓剑），有关民权活动人士姚立法独特经历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作者朱凌），讲述1940年代末期国、共内战以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经历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作者国亚），《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回顾1950—1980年代中国大事的历史丛书《年代怀旧丛书》（编者旷晨），讲述一名原本可以成为市长情人得到高档物质享受的女子通过互联网结识了底层民间思想家及其精神导师后开始新的人生的长篇小说《如焉》（作者胡发云），披露中国新闻界幕后人情世故的《新闻界》（作者朱华祥）等。虽然查禁者对查禁这批书的原因语焉不详，但读过这些书的读者都会明白其中好几部书被禁的原因主要都是涉及到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和反思。

二，造反派红卫兵领袖范正美回忆录出版。2月，原黑龙江省造反派著名风云人物、哈尔滨师范学院红卫兵领袖、曾被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誉为“东北的新曙光”的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一号执政者（时称勤务班班长）范正美，所著回忆录《秋梦追思》，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版权页上印有“人民教育丛书 / 傅国亮主编”，“200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及“书号：ISBN 7-04-017556-X / I 229”等字样。此书不仅正面回忆了作者所经历的黑龙江省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而且基本上站在文革时期的认识角度，在最后部分用了相当篇幅从理论上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肯定。据有关人士称，高等教育出版社并未出版此书，而是书商冒用该出版社的书号非法出版的。

三，老外发起网上追凶。自2月开始，一位名叫本杰明·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的美国律师，在自己的博客里贴出了一组文章，探寻四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

校长卞仲耘被该校女红卫兵殴打致死的来龙去脉，追查谋杀这位四个孩子的母亲的元凶。哈里斯虽然不谙汉语，但是凭着二十年研究谋杀案的经验 and 西方人特有的认真和执著，从并不十分丰富的英文资料入手，循踪觅迹，抽丝剥茧，一步步锁定可能的凶嫌。他的“追捕”仍在继续，博客上不断有新的内容出现。他还留下了电子邮件地址：p u b l o c c @ g m a i l . c o m，期待知情者提供更多的证据。

四，文革四十周年论文集出版。3月，宋永毅主编的《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由香港田园书屋出版。本书汇集了2006年5月由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纽约市立大学、纽约皇后区图书馆合办的“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国际研讨会”中的论文及会外一些学者提交的论文。从不同角度较全面地展示了近年来海内外学者对文化大革命研究的成果。

五，冼恒汉回忆录上网。6月，原中共中央委员、兰州军区第一政委、甘肃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冼恒汉中将生前口述写成的长篇回忆录《风雨八十载》，由其女儿冼玲全部放上博客公开发表。这是文革时期担任过大军区和省级革命委员会一把手的高级干部中第一部实话实说的回忆录。书中记叙了作者所了解的甘肃地区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对作者亲历或参与过处理的一些重大事件特别是有争议的事件（如青海赵永夫事件，宁夏青铜峡事件等）作了如实记叙，还对文革结束后被强加的“四人帮代理人”、“冼家帮”等罪名进行了逐条批驳，对一些不实说法作了澄清。

六，林彪元帅像正式陈列。7月，为纪念中共建军80周年，中国军事博物馆推出“国防和军队建设成果展”。在“十大开国元帅”展版中正面陈列了林彪的元帅像，这是自“九一三”事件林彪坠机身亡后遭受长期批判丑化36年来的新举措，引起外界诸多揣测。此后，9月24日，山西省举办“平型关大捷”70周年庆典时，又为林彪树立了铜像。

七，宋彬彬（宋要武）当选北师大附中荣誉校友。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即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九十周年校庆活动中，于9月9日展出了“知名校友”宋彬彬的展牌，并发行了一册题为《辉煌90年》的图志，在图志的第66页和对开页67页上载有两幅照片：一幅是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为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照片；另一幅是此前被女附中红卫兵活活打死的中共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的照片。此事引起舆论大哗，宋彬彬成母校“荣誉校友”一事被一些校友视为“校耻”，作家冉云飞著文称之为《“文革恶之花”再度开放》。

八，文革史专家王年一病逝。9月13日，被誉为“科学研究文革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的文革史专家、《大动乱的年代》一书作者王年一教授病逝。这是文化大革命研究的重大损失。9月25日，部分王老生前好友和同事在北京举行了旨在研究王年一及其治史思想的追思会，与会者高度评价了王老的道德风范和学术成就，对他不幸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追思会由文衡文化发展中心筹办。一些外地人士提交了书面发言。

九，文革众生肖像画展览。11月18日—12月2日，由文革美术史研究专家王明贤策划，徐唯辛绘制，由今日美术馆、泰康人寿、嘉德在线、寒舍空间联合主办的《历史中国众生相：1966—1976》在北京今日美术馆新馆展出。徐唯辛的这组布面油画（2.5米×2米），共63幅，以客观描绘的黑白肖像群，结合肖像简历文本，再现文革期间的各种人物形象，既有呼风唤雨的政治人物（如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陈永贵、华国锋等），又有饱受劫难的文化人（如顾准、巴金、陈寅恪、胡风等），还有一度叱咤风云的“革命小将”（如聂元梓、包泡、刘长瑜、金训华、黄帅等），文革中的殉难者（如田家英、吴晗、卞仲耘、老舍、遇罗克、郭世英、上官云珠、张志新等）和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从一个独特的侧面记录了文革历史在人们心中的痕迹。

十，纪念林彪百年诞辰。2007年12月5日，是林彪百年诞辰。11月，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由香港明镜出版社出版。此书是继《重审林彪罪案》之后又一部重新评价林彪的文章汇集。同时，林彪的女儿林立衡等亲友（包括不少前国家、军队领导人的子弟）筹备了很长时间，决定在武汉举行隆重纪念活动，议程有：12月4日到林彪出生地林家大湾参观并为林氏三雄（林育南、林育英、林育容）铜像揭幕；5日在武昌举行纪念会议。但临近活动前夕被有关方面下令制止。不过，在北京的部分人士仍然举行了小范围的纪念座谈会。

□ 原载《民主中国》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